

僅將他生平幾件不為一般人所知的事情略一敘述，來證明他是當代政壇不可多得的人物之一。

三十九年當黨國元老吳稚暉先生在臺灣大學醫院養病的時候，曾為他的一個至戚某君向教育部申請畢業證明書的事情，寫了一封懇切拜託的信給天放先生。當時他命令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查核。教育部的大專學生學籍是從南京直接運到臺灣來的，因此相當完整。高教司查核以後簽報說：「某大學大一新生名冊內有某君在；但應屆畢業生名冊內沒有他的姓名，所以只能發給大一肄業證明書；倘若部長特准，仍可發畢業證明書。天放先生儘管一向非常尊敬吳稚老，而申請人又是他的至戚，依然不肯運用部長的特權予以通融。他說：「假如我利用特權，怎樣能叫部屬心服？你替我寫一封信婉復稚老，鄭重道歉，請他曲諒。」這是他一生守法的明證。

部長任滿房子貼光

他出任教育部部長以後，戚友中有些想到大專教書的；也有想到國立編譯館擔任編纂的；也有想活動省立中等學校校長的。但是，他一律婉拒介紹，理由是：「依法我不能向部屬介紹人。」被拒者也許認為天放先生不近人情；可是，他曾告訴我說：「國家若要厲行法治，就要從每一個負有行政責任的人自身做起。」從這些小事裏，我們可以充分看出他的絕對守法。在今日總統昭示我們要革新政治風氣的時候，天放先生的遺言實在值得我們遵循。

他擔任教育部部長四年餘，官俸微薄，不敷

家用。雖然他的夫人持家節儉，却也時感拮据。在三十八年他的夫人初到臺灣的時候，曾經把過去一點積蓄，在臺北市廈門街九十九巷買了一幢很小的日式平房。這時，由于教育部為他買了一幢官舍，他家遷居後，只得將自置的房屋出售，把所得價款彌補家用。到了四十三年夏間他交卸教育部長職務時，售屋款項也就貼光了。他本想立即遷出部長官舍；可是，一時無力再買房屋；而當時是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，照例是不配宿舍的。所以他只好向他的後任張部長曉峯（其昫）說：「我住的官舍，恐怕等我租到了房子以後，纔能遷出。」張部長說：「你繼續住好了。」天

放先生是最自重的人，豈肯久住教育部官舍。幾個月以後，他應聘去美國任華盛頓州立大學教授；不久，他便匯錢給夫人，囑她速租房屋以便遷出。天放先生以卓越的才識，早於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便蒙 總統知遇拔擢。他曾先後擔任江西、安徽、湖北三省教育廳廳長，江蘇省政府秘書長，安徽大學、浙江大學、和四川大學校長，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，安徽省代主席，駐德國大使，中央宣傳部部長等要職；可是，他辭去教育部長的職務以後，連一幢像樣的房子都買不起。這在一般人是不會相信的。但是，我追隨他多年，深知這是千真萬確的。同時，我相信他的同志們和戚友們也都深知他是絕對廉潔的。

他在教育部部長任內，幾次要我隨他前往臺灣中南部視察各級學校，並且應軍方的邀請，前往各軍事學校講學。事前決不讓地方教育行政機構知道，更不接受他們的招待。軍方首長堅持要

請他吃一頓便飯；他堅持要吃和菜，不要全席。每次公出在教育部所領的差旅費，一定要我仔細地核算，連同一切單據併交教育部會計核銷，儘管是少數款項也要繳回教育部總務司出納科。他那種涓滴歸公，一介不苟取的精神，更值得世人效法！

大家都知道：天放先生是一位國爾忘家的革命鬥士，也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與學者。一般人都欽佩他主持教育行政的建樹，作育人材的成就，和量才取士的獻諫。但是，有很多人却認為他在駐德大使任內的表现不够理想。當初我也不免有這種誤解。後來，在天放先生逝世的前一兩年，我細讀他親撰的使德回憶錄以後，纔瞭解：他雖是第一次出任大使，赴任前的充份準備，到任後所作的敦睦邦交各種工作，以及折衝樽俎維護國家利益的情形，即使與經驗豐富的職業外交家比較，也決不會遜色！他是在民國廿四年到任。最初兩年，中德邦交很融洽，兩國經濟與文化關係也很密切；而德國在我國的軍事顧問助我攻進國防也很有貢獻。後來由于希特勒決定要和日本、意大利成立軸心國同盟，而日本又在侵略我國；德華關係的逆轉顯然是世局變化的結果，決不是任何一位幹練的外交家所能挽回的！我想：任何人讀了天放先生的使德回憶錄以後，都會恍然于他當時處境之艱苦，和他始終不懈的奮鬥。

天放先生雖僅享壽六十九歲；但他對於國家，對於領袖已作了很大的貢獻。他在逝世時唯一的遺憾是：沒有及身親見匪幫的潰敗和大陸的收復。